

揭开经济学家真正神秘的奥秘所在



讲述19世纪至今经济学家们的生平 and 学术观点
INFLUENCE WORLD 50 ECONOMISTS

影响世界的50位

其中有许多获过诺贝尔奖的经济学家

经济学家

刘登阁 编著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Yingxiang Shijiede Wushiwei Jingjixuejia

影响世界的50位经济学家

刘登阁 编著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目 录

1. 亚当·斯密(1723~1790年)	01
2. 大卫·李嘉图(1772~1823年)	16
3. 马尔萨斯(1766~1834年)	33
4. 圣西门(1760~1825年)	40
5. 萨伊(1767~1832年)	46
6. 傅立叶(1772~1837年)	54
7. 西斯蒙第(1773~1842年)	62
8. 罗伯特·欧文(1771~1858年)	70
9. 李斯特(1789~1846年)	76
10. 穆勒(1806~1873年)	84
11. 考纳迪(1801~1877年)	94
12. 经济数理派(19世纪末)	99
13. 卡尔·马克思(1818~1883年)	108
14. 韦伯(1864~1920年)	124
15. 马歇尔(1842~1924年)	130
16. 霍布森(1858~1940年)	136
17. 瓦尔拉(1834~1910年)	142
18. 韦伯伦(1857~1929年)	147
19. 凯恩斯(1883~1946年)	165
20. 熊波迪(1883~1950年)	188
21. 庇古(1877~1959年)	199
22. 汉森(1887~1975年)	205
23. 史威吉(1910~)	210
24. 罗宾逊(1903~1983年)	221
25. 丁伯根(1969年诺贝尔奖得主)	227
26. 萨缪尔森(1970年)	238
27. 希克斯(1972年)	249



1. 亚当·斯密

(Adam Smith, 1723 年 - 1790 年)

亚当·斯密这位苏格兰人，外表平常，他在科学史上却起了重大作用，以至英国学者亚历山大·格雷评价道：“亚当·斯密是18世纪的一个卓越的奇才，19世纪他在本国和全世界都有巨大的影响。”

时代的需要，造就有用的人才。经济学既然取决于资本主义经济本身的发展，那么18世纪60年代的英国就已达到有必要建立体系，整理和总结经济知识的阶段。斯密就是能胜任这项任务的人才和学者。这位苏格兰人得天独厚，兼有抽象思维能力和生动叙述具体事物的才华；他学识渊博，又特别严肃认真，科学上老老实实；他善于利用别的学者的思想，又富有独创性和批判精神。

经济科学的魅力，就在于它能帮助人们了解或者最大限度地解释那些表面上简单平常，但对人却是极其重要的现象的涵义。比如货币看来是一种多么简单的东西，没有一个人手中不持有货币，没有一个人不知道货币是干什么用的。但是货币中却隐藏着许多奥秘。对经济学家们来说，这个问题特别复杂，无疑还将长期地充塞在他们的头脑之中。

斯密惊人地发现日常经济现象中充满着浪漫主义色彩。在他的笔下，一切行为，如买和卖、租地和雇工、纳税和贴现，都获得了特殊涵义和情趣。显然，如果没有这一切，也就不会懂得在那制定治国之策的“高尚的”上层领域内所发生的事。在拜伦和普希金时代，政治经济学竟也像文学那样趣味盎然，这得归功于亚当·斯密先生。

但最主要的是，亚当·斯密表达了日益成长的工业资产阶级的利益，但他绝不是他们的忠实辩护士。他不仅仅主观上力求做到在科学上不偏不倚和立论上公正独立，而且在很大程度上做到了这一点。这样一些品质使他有可能创立科学政治经济学体系。按照马克思的说法，他这是“试图深入研究资产阶级社会的内部生理学”。斯密的这部《国富论》是人类文化的重要遗产，是18世纪经济思想的顶峰。

一个苏格兰人

只有看到斯密是苏格兰人，而且是典型的、具有鲜明民族性格的苏格兰人，

才能理解斯密的政治经济学，这一看法早已众所公认。

“苏格兰人，绝不是英格兰人！”一个法国作家就是这样开始写苏格兰人的，那么什么是苏格兰民族性格呢？这个问题，并不是那么容易回答的，有人认为，这个不大的民族（在斯密时代苏格兰约有一百五十万人）的特点是勤劳、节俭、谨慎。有人认为，苏格兰人沉着冷静、沉默寡言，富有进取精神。还有人认为，苏格兰人热衷于议论抽象的题目，“卖弄聪明”。

所有这一切大概多少有些符合实际情况。但是，未必可以如此这般来解释斯密的性格及其观念的特点。苏格兰对他的影响显然更深刻得多，更复杂得多。这种影响不仅决定于平淡而抽象的民族性格，而且还决定于斯密时代这个国家和民族的具体状况。

1707年，英格兰和苏格兰合并为一个国家。这对英格兰和苏格兰的工业家、商人和有钱的农场主都是有利的，两国之间的关税壁垒取消了，苏格兰牲口对英国的销售扩大了，格拉斯哥的商人获得了同美洲的英国殖民地开展贸易的许可。为了这些财富，苏格兰资产阶级准备稍许放弃一点爱国主义，因为在新的联合王国内苏格兰必然要起从属的作用。相反，苏格兰的贵族绝大多数反对合并。他们依靠忠于他们的英勇好斗的山地居民（这些山地居民还生活在带有氏族制度残余的封建秩序下），几次举行起义。然而，经济较发达的苏格兰平原上的居民不支持他们，每次起义都以失败而告终。

合并后，苏格兰的经济开始迅猛地发展，虽然有些部门由于英格兰竞争而蒙受了损失，另外一些部门则由于仍然保存着封建秩序也吃了亏。格拉斯哥市和这个城市港口的发展尤为迅速，在它周围兴建起一个完整的工业区。农村和山区的大批廉价劳动力来到苏格兰，大地主和有钱的租地农场主开始在农业中实行改革。从1707年合并到1776年《国富论》发表这70年间，苏格兰起了急剧的变化。诚然，经济上的进步几乎只能触及到苏格兰的平原地区。但正是在这里，在柯卡尔迪、格拉斯哥和爱丁堡之间的三角地带，斯密几乎度过了他的一生。

到斯密成年时，经济已把苏格兰的命运同英格兰的命运不可分割地联在一起，形成了统一的资产阶级国家。对于从发展生产力和“富国”角度来观察一切的斯密来说，这一点尤为明显。至于说到苏格兰的爱国主义，那么，斯密从它那儿，正像从许多受过教育的苏格兰人那儿一样，接受的是“文明的”、易于激动的性格，而不是“政治性格”。

教会和宗教对社会生活和科学的影响渐渐减少。教会丧失了对各大学的控制。苏格兰的各个大学与牛津和剑桥不同，前者充满了自由思想精神，非宗教学科占主要地位，偏重实际。在这方面，斯密学习和任教过的格拉斯哥大学尤为突出。蒸汽机的发明人瓦特和现代化学奠基人之一约热尔·布

雷克同他一起工作过，并且是他的朋友：在50年代，苏格兰进入文化大高涨时期，高涨之风吹遍了科学和艺术的各个领域。在半个世纪内，小小的苏格兰竟涌现出一批出类拔萃、光彩照人的天才。除上面提到的以外，还有经济学家詹姆斯·斯图亚特、哲学家大卫·休谟、史学家威廉·劳伯桑、社会学家和经济学家亚当·弗格林·斯密同地质学家詹姆斯·哈同、名医威廉·哈汉尔、建筑师罗伯特·阿达姆等人都很熟悉。这些人及其著作的作用不单远远越出了苏格兰的疆界，而且也越出了不列颠的疆界。

斯密的天才就是在这样的环境和气氛中陶冶的。不言而喻，斯密绝不仅仅是苏格兰文化的硕果，他的经济考察远远越过了苏格兰的疆界。美国科学和文化，首先是英国的哲学和经济思想，对他的思想形成所起的影响，并不小于苏格兰的影响。实际上，他的整个著作就是为了要对联合王国、伦敦政府的经济政策起到一定的（反重商主义的）作用。最后，还应指出另一方面的影响，即法国的影响。从玛丽娜·司图亚特时代起，苏格兰同法国就被一条传统的纽带紧紧地联系在一起，因此苏格兰受到法国文化的影响大于英国。斯密十分了解孟德斯鸠和伏尔泰的著作，对卢梭的头几部著作和《百科全书》的问世表示了热烈欢迎。

斯密教授

亚当·斯密于1723年诞生在爱丁堡附近的一个名叫楷考第的小城。他的父亲是一个海关官吏，在他出生前几个月就死去了。亚当是年轻孀妇惟一的孩子，她把自己的一生都献给了他。孩子长得脆弱、多病，不喜欢和同年伙伴一起吵吵闹闹。家庭生活不宽裕，但也不太困难。幸运的是，楷考第有一所好的学校和一位出色的教师，这位教师并不像许多人那样，单单用圣经语录和拉丁文变位法填塞孩子们的头脑。此外，斯密在孩提时代周围就有许多书。斯密的博大精深出众学识，就发端于此。

诚然，斯密由于一些显而易见的原因，没有受过像贵族杜尔阁那样出色的教育。比如，他从未碰上过一位好的法语老师，因此没有学会正确流利地讲法语，尽管他能毫无困难地阅读法语书籍。在18世纪，一个做学问的人，不学会几种古代语言是不行的，而斯密早在大学期间就已掌握了好几种古语（特别是古希腊语）。

斯密在14岁时，便进入了格拉斯哥大学。他修完所有大学生必修的逻辑课后，便转入道德哲学班，从而选定了人文学科的方向。同时他还学习数学和天文学，在这两门学科中也一贯成绩斐然。到17岁，斯密在学生中间已有学者和小怪人的名气。他可以在伙伴的喧哗吵闹声中突然陷入深思，或者开始自言自语，忘记周围还有他人。他整整一生都保持着这些小小的怪癖。1740

年斯密在大学顺利地毕业后，获得了到牛津大学深造的奖学金。在牛津，他差不多度过了六年，从不外出。

教授和学监们严密监视着学生，不许阅读自由思想书籍。在牛津，斯密生活得很苦恼，他一想起自己这个第二大学，就有厌恶之感。他忧郁于怀，经常生病，因此书籍重又成了他惟一的朋友。斯密读书的范围很广，但当时他对经济科学还没有表现出任何特殊的兴趣。

继续留在伦敦已徒劳无益，再加上某些政治事件（1745至1746年的司图亚特拥护者们的起义）的原因，斯密不得不于1746年夏天回到格考第，他在那里度过了两年，继续进行自学。有一次，他去爱丁堡，一个名叫亨利·休玛的（后叫凯姆斯勋爵）有钱的地主对他有了强烈的印象，这个地主建议他这个年轻学者作英国文学的系统讲演。斯密的讲演获得了很大成功，后来他改变了他的讲演题目。其基本内容为自然法。这一概念在18世纪不仅包括法学，还包括政治学、社会学、经济学。斯密也就是在这一时期对政治经济学初次表现出特殊兴趣。

显而易见，他在50年代就已提出经济自由主义的基本思想。在1755年写的文章中曾作过这样一个特殊说明，指出这些思想源于他在爱丁堡的讲演：“人通常被国务活动家和空头设计家（即政治家），看作政治机器的某种材料。空头设计家破坏人类事业的自然进程，应该让人的天性本身自然发展，并在其追求自己的目的和实施其本月计划的过程中给予它充分自由……要把国家从最低级的野蛮阶段提高到最高级的富裕繁荣阶段，只需要和平、减轻赋税和管理中的宽容；其余一切则留待事物的自然进程来完成。凡是采用暴力迫使事件走不同的道路或者企图阻止社会发展的政府，都是反自然的。为了维护权力，他们不得不实行压迫和暴政。”

这是18世纪进步资产阶级的语言，是进步资产阶级对还远没有抛掉自己封建外衣的国家所持的严厉态度。从这段话中可感觉到斯密所特有的英勇、刚毅的作风。正是这个斯密，在《国富论》一书中以愤怒辛辣的笔，抨击“那些阴险狡诈的家伙，即世俗所谓的国务活动家或政客，他们的一切决定，都取决于暂时的变化无常的因素”。这不仅仅反映出资产阶级思想家对当时国家所持的否定态度，而且也反映出民主派知识分子对官僚和政客的深恶痛绝。

1751年，斯密在格拉斯哥大学任教，起初讲授逻辑学，后来讲授道德哲学，即社会科学。在格拉斯哥，斯密度过了12年，每年总要到爱丁堡呆上二至三个月。他在垂暮之年写道，这是他一生最幸福的时期。他生活在他所熟悉的亲切的环境中，受到教授、学生和有名望市民的尊敬。他能够畅行无阻地进行工作，人们也期待他在科学上多做工作。在他身边出现了一帮朋友，他开始沾上了不列颠单身汉和“俱乐部人”（18世纪40年代，在格拉斯哥成立了一个或许是世

界上最早的政治经济学俱乐部。凡参加这个俱乐部的人都称为“俱乐部人”。斯密也参加了俱乐部的活动）那种典型特征，这些特征在他身上一直保持到生命的末日。

1759年，斯密发表了他的第一部科学巨著：《道德情操论》。这部著作标志着斯密哲学和经济思想的形成。

反封建的平等思想在他的学说中占有显著地位。一个人生下来，本是与别人平等的，因此道德原则应同样地适用于每一个人。然而，斯密的出发点是人们行为的绝对、“自然”的规律，他感到伦理学的基础应该由该社会的社会经济制度所决定。所以，他否定了宗教道德和“天赋道德情操”，而代之另一个抽象原则——“同情心”。他想以其“透人腹”之能，根据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人们的地位和感触，并以自己的想像能力，来解释人们的感情和行为。这一思想无论加工得多么精细，有时甚至非常巧妙，也不能成为唯物主义科学伦理学的基础。《道德情操论》并没跨出18世纪就寿终正寝了，并不是这一理论使得斯密名垂千古，而恰恰相反，正是《国富论》的声誉才使这一理论免于被人遗忘。

其实，在《道德情操论》创作的进程中，斯密的科学兴趣方向已发生了显著的变化。他渐渐沉湎于政治经济学的研究，而且越来越深入了。促使他改变方向的不单是内在的志趣，而且还有时代的需要。在格拉斯哥这个工商业城市里，经济问题日益广泛而有力地侵入了人们的生活。创立独特的政治经济学俱乐部，讨论贸易和关税、工资和银行业务、租赁土地的条件和殖民地等等问题，斯密很快成了这个俱乐部中最著名的成员之一。他与休谟的结识和友谊，也促使他更加爱好政治经济学。

19世纪末，英国经济学家E·坎南发现并发表了一批阐明斯密思想发展的重要材料。这是格拉斯哥大学一个学生所做的斯密讲演笔记，后来这些笔记略加校订，又重新抄写出来。从内容来看，这些讲演讲于1762—1763年之间，从中可以清楚地看出，斯密向学生讲授的道德哲学课程，到那时实际上已变成社会学和政治经济学课程。他提出了一系列出色的唯物主义思想，例如：“没有财产私有制，就不可能有国



蒸汽机车的发明带来了一场工业革命

家。国家的使命就在于保护私有财产，保护有产者，对付穷人。”在讲稿的经济学部分中，可以容易地看出一些在《国富论》一书中得到发展的思想萌芽。

20世纪30年代，又发现了《国富论》的头几章草稿。一些英国学者确认这是1763年的文献。在这几章草稿中包括未来著作中的许多重要思想，如分工的作用、生产性劳动和非生产性劳动的概念，等等。还包括对重商主义的极尖锐的批评和对放任主义原则的论证。

斯密在法国

关于斯密1765至1766年间在巴黎的详细情况，老杜邦曾回忆说，斯密常去奎纳医生的“阁楼俱乐部”。然而，他在重农主义者的集会上安然静坐，多半默不作声，因此绝没有人会料到他是未来《国富论》的作者。A·摩莱里在自己的回忆录中写道：“杜尔阁……高度评价他的（指斯密）天才。我同他见过多次，他是经爱尔维修介绍同我认识的。我们谈到贸易理论、银行、国家信贷和他正在构思的长篇巨著的许多问题。”（《18世纪法国大革命回忆录》）从许多信件中也了解到，斯密同数学家和哲学家达兰贝尔以及反对愚昧和迷信的伟大战士霍尔巴赫男爵很接近。斯密曾拜访过伏尔泰，并同他有过几次交谈。他认为伏尔泰是当代一个极其伟大的法国人，早在1755年，他就在《爱丁堡论坛》杂志上发表过一篇文章，说明作者对法国文化极为熟悉。从他的讲稿中可以看出，他非常了解约翰·罗的思想和活动，并读过一些法国著作家写的关于罗的学说体系的著作。看来，他不了解重农主义者的著作，虽然他也读过奎纳和《百科全书》派的文章。

可以说，斯密来到巴黎正是时候：那时他已是一个成熟的学者和成熟的人，因此不会受到重农学派的影响，而同时却能够从奎纳和杜尔阁的学说中接受一切有益的东西。

关于斯密与重农学派，特别与杜尔阁的依从关系问题，是有其历史的。斯密更深入地研究资产阶级社会的内部生理学。他沿着英国传统的轨道，在劳动价值论的基础上创立了自己的经济理论，而重农主义者实际上根本没有提出过价值理论。这使他较之重农学派向前跨出了极重要的一步：任何生产性劳动都创造价值，而绝不仅仅是农业劳动。斯密提出关于资产阶级社会阶级结构的概念，比重农主义者清楚得多。

然而也有一些方面，重农学派比斯密站得高。这特别是指奎纳关于资本主义生产结构的天才思想。斯密在他的关于各种类型生产性劳动是平等的、在经济上具有等价的提纲中缺乏一贯性。他明显地不能摆脱这样一种概念，即从创造价值的观点来看农业劳动仍然值得特别重视，因为在这里同人一起“劳动”的是自然界本身。

斯密对重农学派的态度完全不同于对重商主义者。他把重商主义者看作是

思想上的敌人，虽然他身为教授，一向稳健持重，但对重商主义者仍不惜展开尖锐批评（有时甚至是缺乏理性的）。他认为重农主义者是盟友，尽管走向同一目标的道路有所不同。他在《国富论》的结论中宣称：“这一学说虽然有许多缺点，但在政治经济学这个题目下发表的许多学说中，要以这一学说最接近于真理。”在另一个地方，他又写道，重农主义“未曾、也许永远不会危害世界上任何地方”。这后一句话可以看作笑语。亚当·斯密经常就是这样开玩笑的：板着脸孔，几乎一点不露声色。

斯密这部书中不单包括直接或间接与重农学派有关的法国思想，而且还有大量在法国观察到的情况（包括个人观察到的）、搜集到的例子和例证。这份材料的总调子是批判性的。在斯密看来，法国及其封建专制制度和束缚资产阶级发展的枷锁，是实际制度同理想的“自然制度”相矛盾的最明显的例子。绝不能说，英国一切都好，但整个说来，英国的制度大大接近于“自然制度”，所谓自然制度就是人身自由、言论自由，主要是有企业家活动的自由。在法国的三年，对斯密个人，即从做人的意义上来看，意味着什么呢？第一，大大改善了他的物质境遇。根据他与白克烈公爵双亲签订的协议，他不只在旅法期间，每年可领取三百英镑，而且一直到死都可以退休金名义每年领取三百英镑。这使斯密在以后的十年内有可能专心著书立说；他已不必再回到格拉斯哥大学去了。第二，所有的同时代的人都指出过斯密性格上的变化：精神更集中，精力更加充沛，更富于求实精神，更加刚毅，并已学会同各种人物，其中包括当代世界上最有权势的人打交道的本领。顺便提一下，他没有学会上流社会文质彬彬的举止和风度，在大多数熟人眼里他仍然是一个有点古怪的、漫不经心的教授。斯密的散漫性很快与他的荣誉融合为一体，仿佛成了他的一个组成部分。

经济人与看不见的手

斯密在巴黎度过了一年——从1765年12月至1766年10月。但他在巴黎社交界所处的地位虽然不如他的朋友休谟前三年所处的地位，也不如十年后富兰克林所处的地位。斯密未能在社会中建立起出人头地的地位，这一点，他很清楚。

同爱尔维修的结识，对他具有特殊意义。爱尔维修这个人很有魅力，聪明过人。爱尔维修在他的哲学中力求使伦理学摆脱教会封建制度的枷锁，宣称利己主义是人的自然属性和社会进步的因素。新伦理，实质上即资产阶级伦理学的基础，就是自私自利，就是每个人追求自己利益的自然努力，这种努力只有当别人同样追求自己利益的时候才受到限制。爱尔维修把自私自利在社会中的作用与全世界倾心自然的作用相提并论。与此有关的是人们天生平等的思想：每个人，不管其出身和地位如何，都应该享有追求自己利益的

平等权利，整个社会也就会因此而获得好处。

斯密发展了这些思想，并把这些思想用于政治经济学。斯密所创造的关于人的本性和人与社会相互关系的概念，成了古典学派观点的基础。“homooeconomicns”（“经济人”）这一概念产生稍迟，但它的发明者依据的仍然是斯密。关于“看不见的手”这一著名提法，就是从《国富论》中援引而来的。

斯密的思路可设想如下：自私自利是人的经济活动的主要动机。但人只有在向别人提供劳务，把自己的劳动和劳动产品提供交换的时候，才能追求自己的利益。分工就是这样发展起来的。人们相互帮助，同时促进社会的发展，尽管每个人都是利己主义者，只关心自己的利益。各个人改善自己物质境遇的自我努力，是一个那么强大的力量，以致让他毫无阻碍地行动，就能实现社会富裕繁荣。何况，这种力量甚至能够“克服无数的顽强障碍，即使是妨害其作用的人为的愚蠢法律……”（亚当·斯密：《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在这方面，斯密激烈反对重商主义，因为后者限制人的“天然自由”，即买卖自由、雇佣和受雇的自由、生产和消费的自由。

每个人都千方百计地利用自己的资本（看来实质上不是指随便什么人，而是指资本家），使他的产品具有最大的价值。通常他并没有同时考虑到社会利益，也没有意识到，他对社会利益起了多少促进作用。他所盘算的也只是他自己的利益，但“在这场合，像在其他许多场合一样，他受着一只看不见的手支配，去尽力达到一个并非他本意想要达到的目的……他追求自己的利益，往往使他能比在真正出于本意的情况下更有效地促进社会的利益”（《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

“看不见的手”，是指客观经济规律的自发作用。这些规律既不依照人们的意志起作用，而且往往违背人们意志。斯密以这种形式把经济规律的概念引入了科学，从而向前跨出了重要一步。这样一来，他实质上是把政治经济学置于科学的基础之上了。斯密把利己主义和经济发展自发规律，能借以有效地发挥良好作用的条件，称为自然秩序。在斯密和后来的几代政治家和经济学家看来，这一概念似乎具有双重涵义。一方面，这是经济政策即放任主义政策的原则和目的，另一方面，这是一种理论结构，是研究经济现实的一种“模式”。

在物理学中，抽象的理想气体和理想液体用作认识自然的最有效工具，真实的气体 and 液体反倒显得并不“理想”，或者只有在一些特定条件下才显得理想。然而，将这种反常情况加以抽象，用来研究“纯态”现象，是有很大大意义的。“经济人”和自由（完善）竞争的抽象在政治经济学中也有某种类似之处。真正的人不能归结为自私自利。在资本主义制度下也完全一样，永远没有，也不会有绝对自由的竞争。然而，如果科学不作一定的假设，把无限复杂和多种多样的现实加以简化、模拟，从中分出最重要的特征，那么经济学就不可能研

究大量看得见的经济现象和过程。从这一观点出发，“经济人”和自由竞争的抽象化是完全正确的，并在经济科学中起了极重要的作用。它尤其符合18和19世纪资本主义的现实情况。“经济人”就是人的永恒的、天然本性的表现。

这不是发展的产物，更准确地说，是发展的起点。关于人的本性这样一个超历史的概念，斯密同当时的所有大思想家，特别同爱尔维修有完全一致的看法。

斯密通过“经济人”这一观念，提出了一个具有重大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的问题：关于人的经济活动的动因和动力问题。同时他对这个问题作了富有成效的、在当时来说极为深刻的回答，如果考虑到在他的“自然”人下隐藏着资产阶级社会真正的人。

社会主义科学学说变成社会经济现实之后，也会碰到动因和动力问题。随着资本主义的覆灭，人和剥削人的制度的彻底消除，人的经济活动的纯资本主义动力也就消失了。正如亚当·斯密早就指出的，人的发财致富的欲望归根结底推动着资本主义生产向前发展，那么用什么可以取代人们的这一欲望呢？也许，可以单单用社会主义觉悟、劳动热情和爱国主义，因为在社会主义制度下没有资本家，工厂和土地属于人民，人们为自己而工作着……

不错，社会主义产生着对劳动和活动的新的强大动力。这就是社会主义胜过资本主义的最大优越性。但是单单指望这些新的动力，就等于断送社会主义建设事业。这些动力不是像变戏法似的变出来的，而是在社会和人们自身、人们心理、道德、意识进行深刻改造的过程中发展起来的。在按劳分配起作用的社会里，物质利益理所当然依然是最重要的劳动动力。

放任主义

Laissez faire（放任主义）政策，或按斯密的说法，天然自由政策，直接产生于它对人和对社会的观点。如果每个人的经济活动最终会导致社会得利，那么显而易见，这种活动就无须加以限制了。

斯密认为，在商品和货币、资本和劳动可以自由流通的情况下，社会资源将能得到最合理的、最佳的利用。竞争自由是他的经济学说的基石，像一条红线贯穿在整部《国富论》中。斯密甚至把这一原则用于医生、大学教授和教士。如果让各种宗教和教派的神职人员相互自由竞争，不给任何一个集团以特权，更不给垄断权，那将是最有益而无害的（正如他所暗示的，指他们发挥最高效率）。

斯密的作用并不在于他发现了放任主义原则，而在于他极有根据地系统和逻辑地论证了这一原则。虽然这一原则产生于法国，但使这一原则发展到逻辑极致，并成为经济理论基础的则应是这位苏格兰人。英国变成世界上最发达的工业国后，客观上也希望贸易自由。在法国，重农理论之所以风行，多半是由于开明和自由派贵族的一时高兴，兴头一过，很快也就烟消云散了。在英国，斯密的

“风行”成了资产阶级的信仰象征。英国政府在以后一个世纪实行的经济政策，在一定意义上就是实行斯密纲领。

还是斯密在世的时候，曾留下了这样一个有趣的故事：1787年，斯密在伦敦曾来到一位达官贵人人家。客厅里有许多社会名流，总理大臣Y·皮特也在座。当斯密进来时，全体起立。他出于自己教授的习惯，举起手说：“先生们，请坐。”皮特回答道：“博士，您不坐，我们岂敢坐，我们都是您的学生啊！”这可能只是传说，但很像真的。皮特在贸易方面确实采取许多措施，其精神与《国富论》的思想是一致的。

斯密的放任主义的具体含义如下：

第一，他要求取消限制劳动力迅速流动的一切措施。这首先针对的是手工业作坊、学徒制和移民法这样的一些封建残余。很清楚，这一要求的客观含义是保证资本的行动自由。

第二，斯密主张土地买卖的充分自由。他反对大规模占有土地，提出废除阻碍分散继承土地的法律。斯密还主张土地应转入那些能更经济地利用土地或者愿意把土地投入流通的人手中。所有这一切，都是旨在农业中发展资本主义。

第三，斯密提出取消政府规定的工业和国内贸易管理法的剩余部分。对国内市场上出售的某些商品课以货物税（间接税）仅仅是为了预算收入，而不是为了促进经济发展。在英国，国内商品过境已不再征税。但斯密这一批评在法国却引起尖锐而急迫的反响。

第四，斯密详细批评了英国的整个对外贸易政策，并且制订了对外贸易自由的纲领。这是他的最重要要求，这一要求的最直接目的是为了反对重商主义。自由贸易主义[来自英文“free trade”——自由贸易]就是这样出现的，它已成为19世纪英国工业资产阶级的旗帜。

重商主义政策的整个武库，如力争达到一定的国际收支顺差，禁止某些商品的输入和输出，实行高额进口税，对出口实行奖励，建立垄断贸易公司等等，都陷入了斯密的攻击火网。他特别反对英国的殖民政策，并直言不讳地声称，实行这种殖民政策不是为了国家利益，而是为了一小撮唯利是图者的利益。斯密认为，英国在爱尔兰，尤其在北美洲殖民地奉行的扼杀工业和限制贸易的政策，是一种目光短浅的、荒谬的政策。他写道：“禁止人民大众制造他们所能制造的全部物品，不能按照自己的判断，把自己的资财与劳动，投在自己认为最有利的用途上，这显然是侵犯了最神圣的人权。”（《国民财富的性质和研究的原因》）

这段话发表于1776年，当时英国已在进行镇压殖民地起义者的战争。斯密对美洲共和主义者抱同情态度，尽管他依然是一个仁慈的不列颠人，但他不主张殖民地分离出去，而主张英国和殖民地建立完全平权的联盟。他相当大胆地指责东印度公司在印度奉行的掠夺与压迫政策。同时，斯密还在他的书中写了不少批评

教会和大学教育的尖锐而严峻的话。诚然，他在英国并没有冒杀头和被剥夺自由的危险，更不必担心坐牢，而他的一些法国朋友，如伏尔泰、狄德罗、摩莱里，甚至米拉波，都在不同的时间坐过牢。但是他知道，英国教士、学校当局和报刊下流作家的憎恨和攻击一触即发。他怕这一切，也不掩盖自己的担忧。

斯密的个性之所以有魅力，是因为他尽管生性谨小慎微，却依然大胆地写出自己的著作，而且付印出版了。

《国富论》

1767年春，斯密回到故乡楷考第城，在那里几乎足不出户地度过了六个年头，埋头写他的《国富论》。在一封信中他抱怨说，单调的生活、精力和注意力过分集中于一门课程，正在摧毁着他的健康。1773年，斯密移居伦敦市，自我感觉极坏，认为有必要对后事做些安排，有必要将自己这部著作的遗产权正式转交给休谟。斯密想带着写好的手稿去移交。事实上，他还需要三年左右时间才能写完这部著作。《国富论》与他在爱丁堡四分之一世纪讲课中最初的经济实验很不相同。这部著作的确是他整整一生的事业。

《国富论》全名《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于1776年3月在伦敦出版。出版商是Y·斯特雷亨，是议会的自由派议员、富兰克林的朋友。人们没有马上弄清楚，这部著作的前途有多大。起初，只有少数人能认识斯密这部著作的真正价值，但著作中所提出的尖锐的社会、政治问题很快引起了广大读者的注意。

斯密的这部著作共分五篇。头两篇阐述理论体系的原理，完成并总结了上一个世纪英、法经济学家的许多思想。第一篇实质上是对价值和剩余价值的分析，斯密以利润和地租的具体形式对剩余价值作了探讨。第二篇的标题是“论资金的性质及其积累和用途”。另外三篇是斯密理论的附录，其内容有点接近历史，而主要相当于经济政策。第三篇的篇幅不大，阐述封建主义时代欧洲经济的发展和资本主义的形成。第四篇内容丰富，论述政治经济的历史，并对政治经济学进行了批判。这一篇中有八章评论重商主义，一章评论重农学派。篇幅最大的第五篇，论述国家财政的收支。然而，正是在这三篇中，在具体材料的深处潜藏着斯密对具体经济问题的一些最有代表性的看法。

《国富论》无疑是政治经济学史上最引人入胜的著作之一。当时一位有名的学者指出，这不仅是一篇经济专题论文，而且是“一本描述时代的非常有趣的书”。它明显地不同于奎纳的枯燥乏味的分析图表，不同于杜尔阁的定理，不同于李嘉图的带有深刻抽象了的稀薄气氛的《政治经济学及赋税原理》。

斯密将其渊博的学问、深刻的洞察力和别具一格的幽默贯注于这部著作中。从《国富论》一书中可以读到大量有趣的事物：殖民地和大学、军事和银行、银矿和走私……等等。从现代观点来看，其中许多事物与经济理论未必有直接关系。

但在斯密看来，政治经济学就是这样一门几乎是无所不包的关于社会的科学。

政治经济学研究的基本方法是逻辑抽象法。先在经济学中挑出一系列主要起始范畴，把它们按相互依赖的根本关系联系起来，进而分析更加复杂和具体的社会现象。亚当·斯密发展了这一科学方法。他试图以分工、交换、交换价值这样一些范畴作为基础，建立自己的体系，然后他分析了几个基本阶级的收入。在这个意义上，他的无数的题外插话和描述可看作具有一定证据效力和价值的实例。但斯密没有能坚持这一高水平的科学研究方法。他常常沉溺于平铺直叙和表面的想像，因而他放弃了他那较深刻的分析法。这种双重性的研究方法，客观上是由斯密生活的时代和他在科学中的地位所决定的，主观上是由他智力上的特点所决定的。

马克思说道，斯密的双重性是有理由的，因为他的任务实际是双重的。他力求把经济知识纳入体系，并不只是抽象地分析内在的联系，而且应该描写资产阶级社会，选配定义和概念的名称。斯密的这种双重性、贯彻基本科学原则的不连贯性，对政治经济学的进一步发展具有巨大影响。大卫·李嘉图可能是批判这位苏格兰人的第一个人，他维护作为分析家的斯密，批判作为描述者的斯密。

关于政治经济学这门科学的对象，斯密有很深刻的见解，到日前为止仍不失其意义。政治经济学有两个方面。首先，这是一门研究当时社会中物质财富的生产、交换、分配和消费的客观的、不以人们的意志而存在的规律性的科学。斯密在绪论中对自己研究的头两篇的主题作了表述，实质上就是在阐述他的政治经济学观点。

这是对社会经济结构所持的实事求是的分析方法。研究现实中存在的一切，研究这一现实是怎样发展，又是为什么发展的。另一个方面，按照斯密的看法，政治经济学应该在客观分析的基础上解决一些实际问题，即论证和提出能“保证给人民提供丰富收入或生活资产，更确切地说，即保证人民有可能获取这些东西……”（《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的经济政策。因此，政治经济学应该引导社会建立起秩序，为提高生产力创造最有利的条件。

这是标准的、切实可行的方法，斯密试图以此回答这样一个问题：为了“扩大财富”该做些什么，应怎么做。

18世纪末和19世纪初，斯密学说在英国和法国具有极大影响。那时英法的工业，正在蓬勃发展，资产阶级在相当大程度上掌握了国家政权。

然而，在英国斯密的信徒中间，一直到李嘉图，有独立见解的大思想家没有多少。第一个批评论斯密的人，反映了土地占有者的经济利益。其中最著名的是马尔萨斯和劳杰尔杰依尔伯爵。

在法国，斯密学说起初受到后期重农学派的冷遇。后来，革命转移了对经济理论的注意。到19世纪头几年发生了转折。1802年出版了第一部完全合

乎要求的《国富论》译本，由加尔尼叶译出并加注。1803年萨伊和西斯蒙第发表了自己的著作，这两位经济学家基本上是斯密的信徒。萨伊对这位苏格兰人所作的诠释，比“真”斯密还更加使资产阶级满意。而且，萨伊的许多思想，都接近于斯密的观点。

如果说斯密学说在英国和法国具有进步性，那么，在封建主义反动派占统治地位、资产阶级刚刚开始发展的国家，如德国、奥地利、意大利、西班牙，也包括俄国，则更加感到这一点。有资料表明，在西班牙，斯密的著作最初为宗教裁判所所禁止。在德国，一些反动教授们长期不愿承认斯密。然而，正是在普鲁士这个最大的日耳曼国家里，斯密的思想对历史进程起了一定影响。拿破仑战争时期在那里实行自由资产阶级改良的人们，在一定程度上都是斯密的信徒。

说到斯密学说和他的影响，必须看到，由于斯密缺乏一贯性，由于在他书中存在着各种各样完全对立的观点，因此使观点和原则截然不同的人都能够利用他的观点，并把他看作是自己的导师和先驱者。19世纪20至40年代的英国社会主义者，力图把李嘉图学说扭转过来反对资产阶级，他们同时认为自己是亚当·斯密的真正的精神继承者。这些人的依据主要是斯密关于完全劳动产品和其中扣除部分对资本家和土地占有者有利这一论点。另一方面，法国萨伊学派也自称是斯密的信徒。他们所依据的是斯密的另一种思想：生产诸因素在创造产品及产品价值中的合作。他们也在斯密那里接受了自由贸易思想，但使它染上了粗俗的小贩色彩。

斯密理论有极重要的历史影响，它像一条线一样，一直延续到李嘉图和马克思。

斯密的个性

关于斯密的生平，要说的已经不多了。《国富论》出版后两年，经白克烈公爵和其他有影响的熟人以及景仰者的奔走说情，他在苏格兰爱丁堡弄到一个海关委员的美差，年薪为六百英镑。这在当时是一笔很大数目，斯密在海关一直干到晚年。他后来移居到爱丁堡，在该城旧区租了一所住宅。斯密继续过着以前的俭朴生活，把很多钱花在慈善事业上。他死后留下的惟一贵重物品，就是一大批藏书。

类似斯密那样的官职，在18世纪只有托情面才能弄到，这是一种薪高而清闲的差使。但斯密出于良心和学究脾气，对待自己的职责非常认真，把很多时间都用在公务上。单这一点（再加上年迈和疾病）就使他无法继续深入地进行科学工作。看来，斯密也没有进行科学工作的特别愿望。的确，他最初有过一个计划，写他的第三部巨著——一般文化和科学史之类的著作。他死后留下了一批涉及天文学史的哲学史，甚至各种美学的文稿，都很有意义，不久就发表了。但他很快放弃了这一设想。他的著作重版工作，花去了他相当多的时间。斯